

公私合作与文化振兴：鲁中大鸾桥传统村落保护 实践研究

周连华

山东艺术学院，济南

摘要 | 鲁中大鸾桥村王氏宗族自明代初期迁居淄川，以耕读传家，并逐渐成长为当地最为显赫的科举望族之一，当地流传着“一县科举 半出王门”的美誉。村内至今保存有《王氏世谱》附录所载明代中期以来修建的祠堂、莹地，以及族人王怀琪所修建起的王氏庄园古建筑群，该村因此先后被评为山东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第三批省级传统村落以及第五批中国传统村落。大鸾桥村在近十年的保护实践过程中，地方政府发挥主导作用，同时调动宗族力量与地方民众参与其中，公私合作修缮完成的王氏庄园古建筑群被转化为乡村记忆博物馆，风俗风物、历史名人等地方性知识由此获得展示空间，并成为地方学校师生、政务人员开展传统文化教育与廉洁教育的重要实践基地。这一过程中，村落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地方宗族记忆的激活相互交织，传统村落的公共文化功能显著拓展，村落文化由此实现振兴与发展。

关键词 | 公私合作；文化振兴；大鸾桥村；王氏宗族

Copyright © 2026 by the author(s).

This article is licensed under a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Non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nc/4.0/>



1 问题的提出

传统村落是承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空间载体，其保护与活化利用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进文化自信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随着国家层

面对历史文化保护与传承的日益重视，大量传统村落及其内部的古建筑群得以被重新发现、修复和利用。在此过程中，如何协调地方村落和社会多方力量，探索出一条可持续的保护与发展路径，已成为学界与实务界共同关注的焦点。

当前的保护实践却面临一个核心矛盾：传统村落的修复与利用是一项资金量大、专业性强的长期工程，完全依赖政府财政投入往往进程缓慢，而市

基金项目：山东省艺术科学重点课题《文化“两创”视域下山东地方村落古建民居传承与保护研究》（项目号 L2025Z05160843）

作者简介：周连华，山东艺术学院艺术管理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文化遗产方向研究。

文章引用：周连华. 公私合作与文化振兴：鲁中大鸾桥传统村落保护实践研究[J]. 澄启学刊, 2026, 1 (3) : 87-94.

<https://doi.org/10.68070/vs45dt24>

场化运作又可能出现过度商业开发、背离文化本源的危险。梅晓林等人在对 2004-2024 年中国乡村文化遗产保护与活化研究的系统研究中指出，当前保护机制呈现“自上而下”“工程化”倾向，制度体系碎片化，社区参与不足，活态传承机制缺位，大量非典型性遗产面临边缘化风险。¹潘颖等人则在对传统村落活态性的定量研究中也发现，不同类型村落的失活程度差异显著，其中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失活程度整体较高，人口空心化是造成民俗文化日渐凋零、民俗活动无人问津的重要原因。²由此，探索一种既能有效动员社会资源，又能确保文化传承主体性的合作模式，由此显得至关重要。在这一宏观背景下，宗族作为中国传统乡村社会中曾长期发挥重要作用的内生性社会组织，其当代角色与功能尤为值得关注。既有研究多将宗族视为一种传统的、甚至趋于消解的社会结构，对其在当代，特别是作为文化振兴的能动者与合作者所扮演的积极角色缺乏足够的探讨。

山东省淄博市淄川区大鸢桥村王氏宗族及其古建筑群的保护实践，为此提供了一个极具代表性的研究案例。一是一个在历史上因科举而显赫、在近代一度没落的传统宗族，在当代得以复兴发展，并通过续谱、祭祖等活动重建了跨地域的宗族认同与文化网络。二是村集体组织（村委）主动垫付资金，对已被列为省级文保单位的王氏庄园古建筑群进行系统性修复，显示出强大的治理意愿与经济能力。三是修复完成的古建筑群其内部空间利用与文化展示内容，深刻展现出王氏宗族的历史文化印记，形成了宗族文化与村落公共文化的高度融合。四是这一文化工程并非由上级政府委派，而是村集体主动作为，以复兴宗族文化为主体的实践行为。

这一独特的合作模式引出了本研究的核心问题：在当代乡村文化振兴的背景下，大鸢桥村的村集体与王氏宗族是如何构建起一种有效的合作关系，共同推动村落古建筑群保护与文化遗产？这种合作关系动力机制是什么？合作双方（村集体与宗族）在此过程中分别扮演了何种角色、贡献了哪些关键资源（比如资金、文化资本、组织动员等）？这种内生性的合作模式如何实现了文化保护与活化利用的多重目标（比如教育教化、乡村记忆传承等）？

从理论层面来看，上述问题实质上涉及到了公私合作制度的核心内容。正如陈军指出，公私合作的兴起以治理理论、公共选择理论和合作国家理论

为支撑，三者共同要求“打破国家和社会二元化、国家公部门垄断行政任务的格局，寻求国家公部门和社会私部门之间合作，充分利用私部门的力量，弥补公部门的缺陷，实现公私部门优势互补”。³大鸢桥村的保护实践正是这一理论逻辑的乡土体现：村集体作为公的末梢，与作为私的社会宗族力量，共同承担起古建筑群修复与文化展示的任务。

然而，既有公私合作研究多聚焦于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领域，对传统村落保护中公私合作的具体形态与运作机制还缺乏充分讨论。通过对大鸢桥村这一典型个案的深入剖析，本研究旨在超越“国家—社会”的二元视角，揭示基层村集体与传统宗族组织在新型合作中展现出的能动性、创造性，进而为理解中国乡村文化振兴的内生动力提供一个鲜活的案例。

2 鲁中大鸢桥村及王氏宗族概况

大鸢桥村位于山东省淄博淄川区罗村镇以西，据《淄川区志》记载：“大鸢桥，罗村西里许，约建于元代。”⁴村辖区面积 4 平方公里，耕地 1560 亩，林地 300 多亩，现有村民 1200 余户，常住人口 4000 余人，人均耕地 0.3 亩，符合当地村落“人多地少”的基本状况。大鸢桥村时为多姓杂居村落，姓氏包括王、董、孙、李、朱、韩、杨、闫、徐、陈、高等，其中王姓人口 2000 多人。

大鸢桥村所在的鲁中淄川地区，自古历史文化悠久，这里自汉代起就已经设置有般阳县城，此后曾“为国、为路、为州、为县”。同时，淄川文化传统于历朝各代从未间断，且为古时齐鲁交界之地的区域文化中心。特别是儒家治世思想得以充足传承，龔山康成书院、淄邑般阳书院、郑康成祠等一系列书院及庙宇无不显示出当政者对于儒家正统思想的标榜。正是这一地方文化传统的延续为明清两代淄邑社会崛起数个科举望族奠定了坚实基础。

大鸢桥村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元朝时期，已经有近千年的历史。最初的居民主要姓杨，因此村落被称为杨家庄。明朝初期王氏宗族从河北枣强迁徙至此，并逐渐成为村落中最强盛的宗族。关于村名为何后来改名为大鸢桥村，民间存在两种不同的说法。一种说法是该村东面曾有一座吊桥，因此村名被改为“吊桥村”。但是目前已经没有吊桥的遗迹，因此这个说法难以证实。另一种说法与王氏宗族有关。据民间传说，清朝时期王氏宗族京官王穆的母亲刘氏是侧室，身份较低。当刘氏去世时，王穆的嫡母

1 梅晓林、李险峰：《中国乡村文化遗产保护与活化研究进展：乡村振兴视角下的知识图谱与理论建构》，《地理研究》2026 年第 7 期。

2 潘颖、邹君等：《乡村振兴视角下传统村落活态性特征及作用机制研究》，《人文地理》2022 年第 2 期。

3 陈军：《公私合作理论基础研究》，《延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 年第 4 期。

4 淄川区志编纂委员会编修：《淄川区志》，齐鲁书社 1990 年，第 77 页。

还在世，按照规矩刘氏出殡不能走正门。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王樛和族中长老商议决定从刘氏的灵堂开始修建吊桥，越过正门。由此可见王樛的孝心，杨家庄通过此事被改名为大吊桥。

明朝嘉靖时期，王氏宗族以惊人的速度崛起发展，不仅人口倍增，更是人才辈出。自王氏宗族五世祖王崇义开始，子孙们纷纷踏上仕途，王氏宗族逐渐成为享誉一方的名门望族，王氏宗族前后共诞生了七位进士、十八位举人，还有一百五十多位获得功名的贤者。自清康熙朝之后，随着地方农民叛乱对科举大族的打压掠夺以及国家政权的科举重心由北方逐渐转移至江南地区，淄川地区各大族的科考状况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衰退，所以借助科举而兴的王氏宗族也避免不了渐趋没落的结局。20世纪90年代末，以十八世王克贵、十九世王森等为代表的精英族众开启了新时期的宗族建构活动，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续修家谱，大鸢桥村《王氏世谱》由九世祖王橘肇修于清康熙十二年（1673），初次修谱之时王氏宗族由始祖迁居淄邑已近300年，族内旧传世系图一幅，上载八世名讳，王氏族人担心历世久而湮没无考，遂开始第一次家谱续修。《王氏世谱》初版告竣后，历世王氏宗族又对其进行了9次续修，一直持续到民国六年（1917），大约每隔30年即会续修一次。此后，由于连年战乱再加之世事变迁，王氏家谱就此停修。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伴随着地方“文化热”的兴起，淄川地区的各个大族开始重新续修家谱，王氏宗族从1999年启动征名工作，历时两年，终于在2001年完成第11此家谱续修，此后《王氏世谱》又进行了三次小规模补充续修，并在2012年完成合族第12此家谱续修，此次续修时近百个村庄的三万多族众收编入谱，涵盖区域也从淄川地区，扩展到省内外的各县市区。通过世谱编修的过程，大鸢桥村王氏宗族逐步发展成为一个联宗跨区域的地方大宗族。

二是祭祀祖先。王氏宗族第11次族谱修缮完成之际，祭祖之事被提上宗族议事日程。2001年4月2日清明时节，王氏宗族重新恢复了间断近70年之久的祭祀活动。来自淄川、张店以及桓台等地的40多支王氏脉系接近200人参加了新时期的第一次宗族祭祀。通过这次祭祖活动，王氏家族不但向外界宣布卷帙浩繁的《王氏世谱》（上下册）历时两年修编完成意义空前，而且也借机恢复了中断多年的家族祭祀，并以此为开端将每年的祭祖活动常态化。同时，这次合族性的祭祀及庆典活动也是新时期王氏家族力量的一次全面展示，它充分表明作为大鸢桥村中的最大族姓，王氏家族完全有能力举全族之力完成世谱续谱及祖先祭祀等活动。

三是刊印文集。大鸢桥村王氏拥有厚重的家族

历史与文化，王氏家族精英于2003年开始聚焦于家族历史文集的重新刊印。一方面是对先辈古典文集的复版翻印。《王氏一家言》文集由十世阁学公王敷政肇修于清乾隆癸亥年（1743），后光绪丁丑年（1877）及民国7年（1918）续修两次。《王氏一家言》所载自明宁波公王崇义始，至清梦白公王绍德止，上下跨度达300多年之久，涵盖王氏家族文学显贵之士22人，汇集文稿16本28卷，其中只诗歌就多达2966首。建国后此书在大鸢桥村几乎散佚无存，第11次续谱顺利完结之际，王氏族人随即组织了《王氏一家言》的再版刊印工作，并于2003年完成。另一方面是王氏家族研究期刊《王氏文化》的刊印发行。该内部期刊读本现已整理出版9期，是向内构建宗族历史记忆，向外展示王氏宗族文化的重要平台。

3 基于公私合作的古建筑群修复与展陈

大鸢桥村现存的王氏庄园古建筑群是王氏宗族第十六世王怀琪，通过开设煤矿发迹之后，历经十余年扩建而成。该建筑群由若干座四合院依次组成。建筑物的单体以三间为多，皆为硬山双坡的风格。建筑整体给人以古朴典雅、错落有致的感受。解放后王氏庄园被淄川区粮食局罗村粮管所征用，因此得以完整地保存下来。2015年古建筑群被列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其总占地面积二万余平方米。大鸢桥村结合村落文脉、建筑遗存现状以及文旅发展需求，对王氏庄园古建筑群开展了极为详细的方案规划，以期对古建筑群进行综合开发和利用。根据规划，王氏庄园将分为十三个部分，包括鸢桥王氏馆、七进士馆、王培荀纪念馆、王怀琪故居、王氏宗祠、功德坊、节孝坊、东王林模型、国学馆、工艺馆、民俗馆、王培荀故居以及精英馆，力求实现建筑遗产与宗族文化、乡土民俗的全方位展示。

2015年大鸢桥村古建筑群顺利获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此后，大鸢桥村委着手开始启动古建筑群的修复工作，而充足的资金则是修复工程能否开展的关键所在。按照村委主持推进古建筑申报与修复工作的负责人董志玉讲述，虽然古建筑群已经成为省级文物，且省里针对获批的古建筑群也配套有保护维修资金，但是相关资金需要逐级批复下拨，时间比较缓慢，难以匹配村落快速推进遗产保护的现实需求。尽快推进古建筑修复，并将其尽早打造成可供展示、研学、游览的公共空间，助力乡村振兴，是村委现阶段工作的重中之重。由此，在村书记许立军的主推下，包括董志玉、王森等村委会成员的协助助力、统筹推进，大鸢桥村委最终确立了由村集体提前垫付保护维修资金，尽快推进大鸢桥村古建筑群复修工程的决定。实际上，大鸢桥村集体具备较为充足的资金垫付与资源支撑基础，一

方面大鸾桥村所在的淄博地区是有名的煤矿资源区，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村集体一直运营有村办企业，这也积累起较为稳定的集体资产；另一方面，当前大鸾桥村位于建陶企业聚集区域，且村西就有一座建陶厂，该企业占用了集体的部分土地，村集体通过土地租赁可以获得持续的稳定收益。由此可见，大鸾桥村集体有能力弥补政府专项修复资金到位的时效短板，充分展现出村集体在古建筑保护中的主体能动性与灵活性。

通过对古建筑群当前分布格局、保存程度以及文化价值的深入分析与考量，村集体经过多次协商、探讨以及专家咨询，最终研究决定先期对最代表性的王氏庄园进行复修活化。从2016年开始，大鸾桥村委分三期，有序开始对王氏庄园古建筑群进行修复。而之所以会选择首先修复王氏庄园古建筑群，主要基于两点考虑，一是王氏庄园是大鸾桥村古建筑当中体量最大的一处建筑，有近30间房屋，并且建筑整体保存相对完整。二是王氏庄园是大鸾桥王氏宗族所修建的建筑，通过修复也能够将具有显赫历史底蕴的王氏宗族展示出来。同时，陆续修复完成的王氏庄园古建筑群形成了诸多的空置房间，而怎样对古建筑群的内部空间进行有效利用则成为一大挑战。最终，在村委积极协调以及王氏族众的全面支持之下，王氏庄园古建筑群构建起多主题、分层化的六大文化展示区，实现了共建空间的活态再生与文化价值转化。

第一，中华王氏联谊展示馆。该展示区域集中呈现了王氏宗族代表性族众积极参与中华王氏宗亲联谊会的情况。并将参与联谊会所获得的谱书、合照等资料展示出来。实际上，之所以会搭建该展示区域，则与大鸾桥王氏宗族的外延族众——王家国关系密切。王家国身居聊城市，与淄博市相距二百多公里，但他却心系故乡大鸾桥村王氏宗族，热衷于宗族文化，无论是家谱续修，还是始祖溯源，即使相距大鸾桥村较远，他都身体力行的参与其中，多次赶赴大鸾桥村参加清明祭祖，且尽其所能捐资支持宗族诸多活动的开展。正如大鸾桥王氏宗族核心成员王森评价王家国说：“他不是收入最多的那个人，但是他却捐出了积蓄最多的那一份。”⁵这足以显现出王家国对于王氏宗族事业的支持力度。特别是在王氏宗祠的复建募捐资金过程当中，王家国前后捐资共计22万元，占到了王氏宗祠复建资金的近三分之一，他的个人贡献对王氏宗祠的顺利复修至关重要，其无私奉献的宗族情怀，也被王氏宗族精英王克贵在宗祠落成典礼当中重点表彰。而设立起来的中华王氏联谊展示馆，不但是对宗族乡贤默默

奉献精神的充分认可，更是当代宗族跨地域文化凝聚、协同参与村落文化振兴的生动体现。

第二，王培荀纪念馆。王培荀是大鸾桥王氏宗族晚清时期最具有影响力的科举士人，可以说他的科举之路历经坎坷，清光绪十五年（1835年），他在52岁之时才获得科举功名，由此出仕为官，其奉旨上任之地竟然在距山东两千多里的蜀地。纵然如此，王培荀毅然赶赴四川上任，此后其政治生涯也都是在四川渡过。居官十四年当中，由于王培荀清廉为政，不攀附权贵，晋升基本无望，所以他一直都是七品知县。虽然仕途不顺，但是王培荀却懂得淡然面对，在处理好日常政务的同时，他与友人悠游于山林之间，借景抒情，写文作诗，怡然自得。王培荀著述丰赡，留下了包括《听雨楼随笔》《乡园忆旧录》等在内的三百余万字的诗歌文章。回归故里之后，王培荀还努力发挥余热，在地方书院教书育人，而他在大鸾桥村所居住的房屋（官宅）虽然历经岁月的洗礼也被保存下来。当前由于传统村落保护的修缮资金有限，所以大鸾桥村委首先对王氏庄园古建筑进行了维修，并在修复完成的建筑中设立起王培荀纪念馆，馆中正堂中间悬挂着王培荀的画像，画像两边则是一副红色的对联，上联为“德政直堪追子产”，下联为“士林长此念文翁”。此外，两侧墙壁还悬挂有王培荀大事年以及他在四川做官时部分友人的文字介绍，馆中展柜当中还有王培荀的传世著作文集。王培荀并不是大鸾桥王氏宗族历史上最为显赫的族人，由于他生活的年代距今不足二百年，他在村落居住过的房屋、传世的印章和文集以及村民口口相传的关于他的传奇故事至今仍旧可见⁶，由此不难理解王氏庄园古建筑群当中为何会专门设立起王培荀纪念馆。

第三，大鸾桥村石刻展示馆。该馆聚焦村落现存石刻文物、墓志铭、碑刻等文化遗存，系统呈现乡土石刻艺术，是展示村落物质文化与历史记忆的重要展区。石刻馆当中保存最重要且最完整的石刻当属发现于2015年的王怀琪及其母亲的石刻墓志铭。王怀琪作为大鸾桥村王氏宗族第十六世，在民国动荡的年代之中，凭借发展地方实业的煤井开采，进而崛起成为淄川当地的民族资本家，逐渐积累起资产的王怀琪不但建造起了规模庞大的王氏庄园住

6 村内相传王培荀本人才华横溢，他能准确预测科举考题，曾前后卖予三人试题考卷，且三人皆高中为官。王培荀本人直到近40岁才去参加应试，乡试高中举人之后，又过了15载他才赴千里之遥的蜀地为官。他到四川履职时需要到州府递文书，恰好发现四川知府正是他卖予卷子的那三人中的一人！所以，王培荀在四川为官的15年间仕途比较平顺，虽然他本人不谙世事，也不懂得阿谀奉承，但是总体来说无人与他为难。

5 访谈对象：王森，男，1950年生；访谈人：周连华；访谈时间：2025年7月5日，访谈地点：大鸾桥村。

宅区，同时还购置了数百亩土地。实际上，王怀琪是王氏宗族传承到民国时期最后一位具有较大地方影响力的人物，王怀琪虽然出身贫困，但是他始终对文化充满敬意。清光绪年间，他通过捐款朝廷获得同四品官职，虽然这只是一个虚位官职，没有实际权力，但是王怀琪试图通过这一过程获得地方社会的认可。此外，王怀琪还热衷于宗族文化活动的开展，民国时期宗族的续修家谱、祭祀祖先、刊印文集等活动的开销大都是由他来支持。所以王怀琪去世之后，在村西的西山与西河的交叉处东北方向修造了自己的坟墓，虽然王怀琪的坟墓规格与王氏宗族清初王鳌永的谕葬无法比拟，但也尽显豪华之气，墓葬在村落整修道路的过程中被无意发现，墓中四周墙壁之上刻画有精美的装饰壁画，棺槨虽然已经年久受潮出现部分腐烂，但其长有两米多，宽有一米多，棺槨的体量也显示出王怀琪的身份等级。而墓葬中出土最重要的当属王怀琪的墓志铭，碑刻保存相当完整，铭文中清晰记载了王怀琪的生平履历、实业发展以及家风品行。此外，王怀琪墓葬之旁还发现了其母亲的墓葬，同样出土了非常完整的石刻墓志铭。这两通完整的墓志铭现在都较为完整的保存在石刻展示馆中。而村委与王氏宗族通力合作，对村落出土石刻进行保护、整理与展陈，通过公私合作实现了出土文物的资源转化与教育利用，让沉寂的历史遗存成为可感知的村落文化资源。

第四，进士名人展示馆。大鸢桥王氏宗族作为鲁中地区最负盛名的科举望族之一，淄川当地流传着“淄邑科举半出王门”的美誉，王氏宗族明清两代共计一百四十多名宗族子弟获得科举功名，其中包括7名进士和18名举人。王氏庄园古建筑群在一期工程修建完成之后，村两委为了展现王氏宗族科举传家的辉煌历史，专门请画家绘就了王氏宗族最为知名的9位（7位进士和2位荫补为官者）族人的画像，并设立起进士名人展示馆。而这9幅画像分别是：王氏宗族六世祖王崇义，明代嘉靖十七年（1538年）中进士，官至宁波太守；七世祖王君赏，明代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中进士，官至中书舍人、浙江道监察御史；七世祖王晓，明代隆庆五年（1571年）中进士，官至浙江巡按；七世祖王载扬，明代万历十九年（1591年）中进士，官至淮安府海州知州；八世祖王泽永，明代万历三十九年（1611年）中进士，官至清丰县知县；八世祖王鳌永，明代天启五年（1625年）中进士，官至户工二部右侍郎，死后追赠户部尚书；九世祖王樛，官至銮仪卫指挥僉事；十世祖王敷政，清代康熙二年（1663年）中顺天府举人，承袭世职，拜他喇布勒哈番；十四世王宁远，清代乾隆十年（1745年）中武进士，后被授为御前侍卫。完整的宗族谱系展示，系统还原出王氏宗族数百年来的科举之盛，也实现

了优秀宗族文化的活态传承，为当代乡村振兴、家风建设提供了生动案例。

第五，家具陈设展示馆。该馆以乡土生活遗存、古建筑技艺展示为核心，集中陈列了旧时大鸢桥村所保留下来的部分室内家具，包括八仙桌、罗圈椅，以及通过数次动员村民征集而来的食盒、灯具等老物件。此外，展馆依托修缮过程中的考古发现，将明清古建筑内部的地暖系统修复展示出来。众所周知，鲁中地区处于北温带，冬季气候较为寒冷，该区域的民居建筑之中普遍都会修造火炕、地暖等取暖设施。古建筑群修复过程中，施工团队在东厢房地面区域发现了保存完整的地暖系统，村委联合宗族精英、修缮团队进行了保护性修复，并在原址进行展示，这既保留了原生态的营造技艺，又通过场景复原，实现了建筑技艺与民俗文化的双重展示。

第六，王氏宗祠。这是王氏庄园古建筑群当中唯一的一处新修仿古建筑，也是村集体与宗族公私合作、同建同享的核心文化场域，充分体现出政府引导、集体统筹、宗族参与的基层文化遗产保护模式。在村委整体规划布局下，由村集体无偿提供建设用地，王氏宗族合族募捐资金建设而成。王氏宗祠的建设完善了王氏庄园的整体功能，宗祠为五大间仿古建筑，最东间为议事厅，里面摆放有桌椅，是宗族商议事宜的场所，最西间为藏书室，是王氏宗族当中擅长书法、绘画的艺术家捐献作品的展示区域，中间三间为公共祭祀空间，正中悬挂着王氏宗族始祖王贵的画像，画像之下的长条供桌上摆放有《王氏世谱》《王氏一家言》以及印有王氏家训的立瓷盘，长条供桌之前是一张八仙桌，桌两旁有两把红木靠背椅，而八仙桌前则是一尊铜制香炉。祭祀厅的两侧墙壁同样悬挂着与进士名人展示馆相同的9位（7位进士和2位荫补为官者）王氏宗族最为显赫的族人画像，与进士名人展示馆内容相互呼应，形成了完整的宗族文脉展示体系，这不但是宗族凝心聚力的精神载体，更是村落家风传承的重要公共场域。

总之，自2016年以来，大鸢桥村积极动员乡村精英参与传统村落的保护与发展，村内的政治精英、宗族精英等多元力量被充分调动起来。其中，以许立军书、董志玉为代表的村落政治精英充分认识到古建筑群对于带动乡村振兴的重要性，由此全力谋划修复保护资金，不惜通过村落财政可供利用的资金提前垫付使用，确保修复保护工程能够如期进行；以王克贵、王淼为代表的村落宗族精英，将宗族的当代复兴积极地嵌入到传统村落的保护与发展过程当中，在传统村落文化内涵得到了显著提升的同时，王氏宗族也到了基层政府的认可与支持，他们在积极对接国家政策扶持传统村落保护的同时，并对村落已有的历史文化进行系统梳理与发掘，特别是大

鸢桥村王氏庄园各个展厅的文化内容展示，都是由宗族精英参与完成。这种村集体主导、宗族赋能的公私合作模式，不但实现了古建筑物质载体的有效保护，而且完成了乡土宗族文化的活态传承，有效推动了村落公共文化的建设与完善。

4 基于文化振兴的古建筑群保护与利用

王氏庄园作为大鸢桥村古建筑群的主体部分，自2016年开启系统修复以来，分三期工程有序推进，至2021年王氏祠堂建设落成，形成了三十余间房屋组成的院落式民居建筑群格局。如前文所述，王氏庄园之中进行了六个地方文化展示厅的设置。但是受制于乡村区位条件、基础配套、服务体系不完善等现实因素，村落暂未开展文旅商业开发，而是立足地方文化振兴需求，优先从文化教育赋能、乡村记忆留存、宗族秩序重构三个方面，探索古建筑群活化的本土路径，实现遗产保护与乡村文化建设的双向赋能发展。

一是打造乡土文化育人空间，筑造优秀传统文化基层传播阵地。大鸢桥村作为淄博罗村镇第四大村落，村落公立幼儿园自1996年开园以来，一直坚持办学，是罗村镇为数不多的依然保持有基础教育学校的村落。从2018年开始，大鸢桥村幼儿园大班的学生们每年都会在王氏庄园新修复的“成长之门”之前举办毕业典礼，罗村镇党委宣传委员刘惠彬评价此活动说：“孩子们身穿汉服，走过成长之门，感谢老师们的恩情，当时的场面真可谓热闹非凡、感人至深！”⁷

2018年王氏庄园入学礼活动议程

第一项：正衣冠佩戴徽章。

第二项：齐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王家大院门口）。

第三项：解读习近平关于家风家训等方面的讲话，习近平关于家风家训方面的讲话指示等（大门口内）。

第四项：学习名人家风家训（进门右拐院内）。

第六项：讲述我身边的好人（道德模范、感动中国人物）等（进门左拐研究馆内）。

第七项：开展入学礼（升学礼、参军礼、成人礼等）（启蒙馆内）。

第八项：参观王氏庄园，进行村史教育。

第九项：收看红色教育片（讲医疗保健、讲理论、讲道德、讲法律等多项内容讲座）。

第十项：说句心里话（填写爱心卡）。

此外，作为传统村落教学实践基地，王氏庄园也吸引了包括山东大学、山东理工大学、山东艺术

学院等高校在内的民俗学、历史学、文化遗产等专业的师生开展文化考察与学习。同时，《罗村镇人民政府2021年度罗村镇法治政府工作报告》当中明确提出，要深入推进“法德共建”工程，严格贯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法治建设的政策要求，以大鸢桥村王氏庄园为核心示范点，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法律文化与乡土治理智慧，将法治精神、德治理念融入乡规民约与家风家训建设，构建法治、德治、家风兼顾的基层治理新模式，进一步凸显王氏庄园在地方基层治理中的重要价值。

淄川鸢桥王氏家训⁸

书香门第，翰墨溢庭。耕读继世，宿儒家风。
文思安邦，武志疆平。秉政廉洁，寒玉洁松。
奉公守法，身直影正。德行坚贞，品节鲜明。
践诺守信，谨言慎行。贻谋忠厚，积德余庆。
浩然大度，淳实宏通。三纲笃守，五常传承。
克勤小物，志坚业精。俭以养德，奢乃致穷。
昏定晨醒，兄友弟恭。睦党友里，谦和互敬。
先贤懿德，瓜瓞绵永。兴旺开来，振吾家声。

宗族组织是中国传统乡村社会治理的核心载体，主要以家风家训、宗规族约为核心内容，承担着约束族众行为、凝心聚力、规范乡土秩序的重要功能。在乡村自治的当代背景之下，传统宗族的优秀文化不再是落后的乡土遗存，而是赋能乡村文化振兴、完善基层治理的重要内生资源。大鸢桥王氏宗族传承数百年的耕读家风、廉洁家训以及向善品格，能够有效联结新时代乡村精神文明建设的要求，具有较高的当代传承与推广价值。

二是活化乡土遗存场所，打造地域特色乡村记忆博物馆。乡村记忆博物馆是传统村落保护物质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场所。传统村落作为重要的记忆空间，承载着历史、社会、文化等维度的价值，对其保护应该实现从他者保护向自我保护的转变，以“适度设计”为理念激活村落的内生动力。⁹大鸢桥村所在的鲁中淄川地区，乡村经济社会发展良好，在城镇化进程当中，大鸢桥村虽然也存在青年人向中心城市迁移的问题，但是借助于村集体的力量，村落在西北方向的开阔区域建立起一排排现代化的楼房。这也满足了部分村民追求更好居住条件的诉求，当然这一过程也把部分青年人留在了村落。同时，由于大鸢桥村人均耕地很少，仅仅依靠农业劳作已经无法获得充裕的收入来源，基于此种情况，村委将土地化零为整，集体承包给农业种植大户，

8 淄川大鸢桥《王氏世谱》续修委员会：《王氏世谱》（第11次续修），2001年，第5页。

9 刘东峰：《乡村振兴战略视域下传统村落内生动力的激活——基于记忆空间设计的视角》，《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5期。

7 访谈对象：刘惠彬，男，1987年生；访谈人：周连华；访谈时间：2025年7月5日，访谈地点：罗村镇政府。

进行粮食以及果树种植，而村民每年都会获得土地的承包费用。所以，当大鸾桥村地方民众的生活变得越来越富足，迈向美好生活的时候，逐渐走向没落的生产劳作模式、生活习俗传统等地方文化具有重要的历史加注，非常有必要在传统村落当中以博物馆的形式将其保留记忆下来。也正是有基于此，王氏庄园古建筑群当中开辟出六大展示空间，其中除了王氏宗族显赫科举历史的展示之外，当然还有对于大鸾桥村地方物质文化与非物质文化的呈现，比如从事农业生产的器具以及淄砚的制作技艺展示等。当前，以王氏庄园为载体的乡村记忆博物馆，已经成为民众回望村落历史、感知乡土文化、凝聚乡愁认同的重要公共场域。

三是重构宗族礼仪空间，搭建当代敬祖收宗的核心阵地。20世纪初，英国人类学家莫里斯·弗里德曼在观察中国东南地区的家族时，即指出：“当宗族超越一个聚落体或聚落群，并在外部加以扩展时，就形成了分散性世系群，具体指一个地域世系群中的一部分成员分散居住到聚落之外。”¹⁰实际上，这一家族延展的过程当中既有分裂，又有合作。而大鸾桥村王氏家族作为鲁中地区崛起于明代中叶的地方大族，历世外迁族众甚广，据2012年第12次《王氏世谱》统计，大鸾桥王氏宗族外延村落已达近100个，收录世谱族众近三万人，于淄邑可谓绝无仅有。王氏庄园的修复为分散各处的王氏族众提供了固定的文化归属载体。当前，王氏宗祠常态化的承担清明、中元、冬至、春节等传统节点的祭祖礼仪活动，而通过规范化与常态化的宗族祭祀仪式，重构当代宗族礼仪秩序，强化跨地域族众的宗亲认同、文化认同与族间凝聚力，实现了传统宗族文化的当代活化与正向赋能。这一实践印证了宗族文化在乡村文化振兴中的内生价值，为传统宗族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提供了鲜活的基层个案。

结语

大鸾桥传统村落的保护实践成功探索出了一条公私合作为核心动力的传承保护与乡村振兴路径。这一模式的有效性关键在于村委与宗族组织形成了优势互补、合作共赢的伙伴关系。一方面作为公存在的村委充分发挥了主导与组织保障作用，特别是凭借强大的经济实力和行政组织能力，村委主动垫付修复资金，高效推动了古建筑群的系统修复工程，并为后续活化利用提供了稳定的政治和物质支持。另一方面作为私的王氏宗族提供了文化主体与核心资源，复兴后的宗族通过续谱、祭祖、刊印文集等

活动，重建了跨地域的文化认同与集体记忆，为保护实践注入了深厚的文化内涵与情感动力。地方宗族精英的捐资以及所掌握的家族历史知识，成为古建筑群内容建设与空间塑造的核心资源。

大鸾桥村委与王氏宗族的合作不仅成功修复了作为物质遗产的王氏庄园，更使其焕发新生，进而成为集教化、记忆以及传承于一体的乡村文化综合体。其已经成为学校传统文化教育、政府廉洁法治教育的重要基地，以及凝聚村民乡愁记忆的公共空间，显著促进了地方村落文化振兴。大鸾桥村的实践保护案例展现出在当代中国乡村，基层村集体与传统宗族并非简单的对立或者消长关系，而是可以基于共同文化认同以及发展目标，通过切实有效的协同合作，进而激发内生动力，为传统村落的可持续保护以及乡村振兴提供了极具参考价值的本土经验。

10 杜靖：《社区纽带和宗族结构的同化问题——对宗族血缘与地缘叠合程度的再思考》，《地方文化研究》2018年第6期。

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 and Cultural Revitalization: A Study of Traditional Village Conservation Practices in Dadiaoqiao Village, Central Shandong

Zhou Lianhua

Shandong University of Arts, Jinan

Abstract: The Wang clan of Diao Qiao Village in central Shandong migrated to Zichuan during the early Ming Dynasty and, adhering to the tradition of combining farming and education, gradually developed into one of the most prominent imperial examination lineages in the region, with a local saying that “half of the successful candidates in the county came from the Wang family.” The village still preserves ancestral halls, burial sites recorded in the Genealogy of the Wang Family, and the Wang Family Manor complex constructed by Wang Huaiqi, a member of the clan since the mid-Ming period. As a result, Dadiaoqiao Village has been successively recognized as a Key Cultural Relics Protection Unit of Shandong Province, a provincial-level traditional village, and one of the fifth batch of traditional Chinese villages. Over the past decade of conservation practice, Dadiaoqiao Village has adopted a collaborative approach in which local government has played a leading role while mobilizing clan forces and local residents to participate in heritage preservation. Through this 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 the restored Wang Family Manor complex has been transformed into a rural memory museum, providing a platform for the display and dissemination of local knowledge, including customs, traditions, and historical figures. It has also become an important practical base for traditional culture education and integrity education among local students, government officials, and community members. In this process, the preservation of cultural heritage has become intertwined with the revitalization of local clan memory, significantly expanding the public cultural functions of traditional villages and contributing to rural cultural revitalization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Keywords: 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 cultural revitalization; Dadiaoqiao Village; Wang clan